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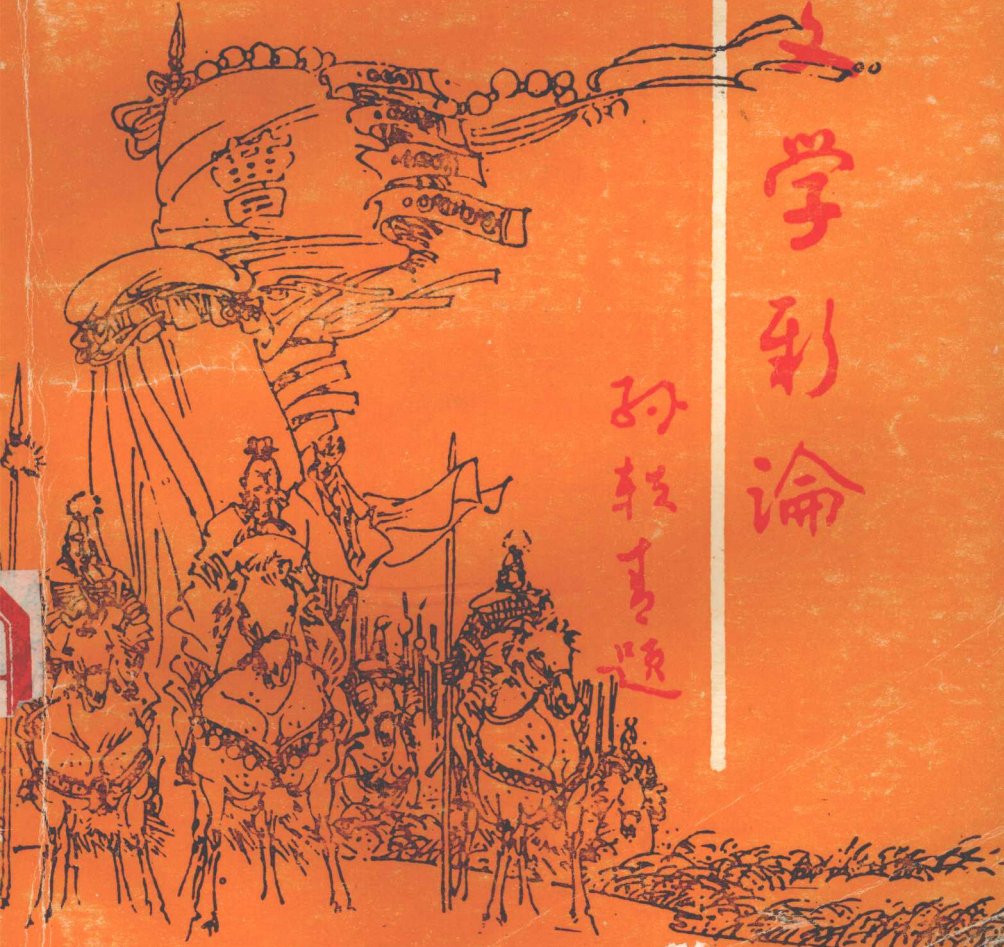
胡世厚

萧永庆

卫绍生

建安文学新论

孙 轶 题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05号

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

## 建安文学新论

胡世厚 萧永庆 卫绍生 主编

---

责任编辑：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中州古籍出版社发行 郑州市黄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227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 7-5348-00706-9/I·278 定价：5.00

# 前 言

胡世厚 萧永庆

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文学的自觉”时代自此而始，震响千古的“建安风骨”在这一时期形成，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三曹”与建安七子的主要文学活动也是在这一时期。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建安文学近年来受到了研究者广泛的重视。1991年4月5日至9日，由河北省社科联主办的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河北邯郸举行，就是1983年安徽亳县、1988年河南许昌两次讨论会兴起的建安文学研究热的继续。这次讨论会上，来自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北京、上海、广西、湖南等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就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与评价，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及意义，邺下文学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积极有益的争鸣。

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这次讨论会上，与会者从新的角度对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作了深入的探讨。有的论者认为，建安文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二是五言诗居于主要地位，三是辞赋在建安文坛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咏物小赋大量涌现，成为建安文坛上的一股强大势力和建安时期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有的论者探讨了建安文学的抒情性特征，认为建安文学的成就更重要的应该是在汉乐府的基础上对汉乐府的改变，是“言志”和“言情”味的加浓，主观抒情性的占主导地位。建安文学这种以表现自我思想感情为中心的

“言志”“言情”之特色，正是文人诗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有的论者指出，建安时期，辞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取得的成就上，都不亚于诗歌。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抒情咏物小赋，而且也有大赋。就当时文坛地位而言，诗歌并没有超出辞赋。不少人认为诗歌在建安文坛占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一种错觉。有的论者认为，建安时期伴随着文学的自觉而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建安文学主体的邺下文人创作，就创作形式而论，大都是唱和赠答、应诏奉命的产物。文学创作成了有意识的游戏活动，王粲等邺下文人则是这种游戏活动的参与者。他们被放在了近似文学侍臣的尴尬位置上。这从一个方面对映出建安文学的尴尬。建安时期的游仙诗和表现隐逸生活、吟咏隐逸情趣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试图超脱人世、企羡仙道和隐逸的出世倾向。这些作品虽不乏慷慨之气，但其主导倾向却显得过于消沉。有的论者认为，建安文学的主旋律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对“悲凉慷慨”感情的真实抒发，一是对建功立业愿望的强烈呼唤。所谓建安风骨，其实是对这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文学艺术风貌的概括和总结。

自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之后，邺下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人团体。这是一个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的文人团体，其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的原因。有论者认为，邺下文人集团是在北方基本平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其组织是因曹操诸子（主要指曹丕与曹植）“高选官属”的扩大而形成的。它原本虽不是为文学创作而建立，但这种组织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实际上担当了文学组织的功用。这个集团是以政治官属为核心，联系其他文学家共同参加文学活动的群体。有的论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探讨了建安文人集团形成的原因，就宏观而言，建安文人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时代、独特的客观环境，曹操政治上采取的许多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规律、具有明显

进步作用的措施，都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从宏观方面来看，握有实权的曹氏父子提倡文学创作、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出现、建安文学顺应文学发展潮流、继承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是应予重视的。有的论者认为，曹氏父子在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推行屯田、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曹操蓄意网罗文士，曹氏父子卓越的才华对文士的吸引力，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变迁，对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都有促进作用。有的论者指出，邺下文人集团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产生的，它既是一个文学组织、又是一种政治团体，从其内部结构与成分看，它实际上是封建官僚世族与中下层士大夫的结合体。关于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意义，一些论者认为，邺下文人集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文人团体，它不同于西汉文人的梁园之游，与后世因共同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见解而自觉组成的文人社团也不一样。它的出现，不仅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揭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一页，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曹操攻占邺城至曹丕代汉自立，前后历十六年。这期间，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创作都是以邺城为中心展开的，他们的邺下交游与创作，集中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邺下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安文学的主体。正是因此，与会者对邺下文学的分期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展开了热烈的争鸣。有的论者认为，邺下文学的分期应当考虑建安文人聚居邺下、曹氏兄弟成为邺下文人的中心和当时的政治因素，提出了邺下文学三期说：建安九年至十六年（211）是邺下文学的第一阶段，此期曹操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至建安二十二年（217）王粲等相继去世，是邺下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时期，此期“三曹”与邺下诸子各呈异彩，成就斐然；建安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220），是邺下文学的衰落期，此期

作品很少，成就不大。有的论者以为，邺下文学应是指建安十六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曹植为平原侯，曹操为他们各置官属以后到建安二十二年王粲、陈琳等相继去世为止。曹丕是邺下文学活动的主要支持者，曹植只是唱和者。建安二十二年以后，建安文学转入了以曹植创作为中心的时期。有的论者不同意上述两种划分法，指出作为建安文学主体的邺下文学，其正式出现应该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创作条件，一是邺下作家群的聚会，二是唱和赠答的创作形式。根据这两点来考察，邺下文学的正式开始，既非建安九年，亦非建安十六年，而是建安十四年（209）。这一年，曹操在襄阳举行盛大宴会，新归附曹操的王粲、繁钦等人参加了这次宴会，《神女赋》等唱和之作，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出现的。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是邺下文人最活跃、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建安二十二年，北方流行瘟疫，刘桢等人皆死于这次瘟疫，次年，徐干、繁钦亦相继辞世，邺下文人所存无几，邺下文学遂告衰落。可以说，建安十三年前是建安文学的自为阶段，其特征是抒发进取精神、渴望功名事业；建安十四年以后，是有组织有安排的创作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邺下文人都把文学创作作为逞才使气的手段；建安二十二年以后，又转为抒情言志、反映社会，成为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建安时代文学的自觉。

提交给会议的论文还就曹丕的评价、曹植的辞赋和游仙诗、建安七子的创作与评价，以及蔡琰《悲愤诗》、邯郸淳的《笑林》、建安女性文学、建安民谣、建安散文使事用典的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这次讨论会收到论文近四十篇。我们从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章二十四篇汇为一册，题名为《建安文学新论》，交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篇幅所限，还有一部分很有价值的论文没能收入。对选入的这些，我们也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和改动。限于编

选者的学识水平，对所收文章的编选和删节未必尽为妥当。不妥之处，尚望同仁见谅。

《建安文学新论》的出版，得到了河北省社科联的资助，得到了学界同仁和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建安文学是一块尚待继续深入研究和努力拓展的领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兴趣，进而推动建安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 目 录

- 前言.....胡世厚 萧永庆 ( 1 )
- 试谈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王 巍 ( 1 )
- 略论建安文学的突起.....刘伯严 ( 12 )
- 论建安文学的主旋律.....刘心长 ( 22 )
- 试论建安文学的主观抒情性.....魏娟莉 ( 31 )
- 文学的自觉与消沉
- 建安文学三题.....胡世厚 卫绍生 ( 38 )
- 也谈“建安风骨”.....孟双全 ( 50 )
- “建安风骨”不应仅指风格刚健之作.....周文铮 ( 63 )
- 邺下文学论略.....傅 刚 ( 76 )
- 邺下文学集团考.....胡大雷 ( 88 )
- 建安年间的邺下文学作家群.....牛润珍 ( 100 )
- 试论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李彬凯 石云涛 ( 113 )
- 建安文人集团成因浅探.....赵西尧 ( 123 )
- 曹丕放议.....周家驹 ( 130 )
- 曹丕《燕歌行》非最早的七言诗.....夏 炜 ( 142 )
- 曹植赋简论.....李伯齐 王 琳 ( 149 )
- 再论曹植的游仙诗.....陈飞之 ( 162 )
- 曹植妇女题材诗歌鉴赏异说.....张 蕾 ( 177 )
- 从曹植看气质浪漫之文人的从政悲剧.....李 娜 ( 190 )
- 论建安七子.....俞绍初 ( 197 )



## 统一大业的颂歌休明政治的赞曲

- 王粲《从军诗》（其一）浅析……………张弦声（207）
- 蔡琰《悲愤诗》创作基因试绎……………董琳（211）
- 论建安散文使事用典的艺术表现……………唐晓萍（221）
- 建安女性文学及其精神意蕴……………马宝记（236）
- 邯郸淳及其《笑林》……………李全民（245）
- 甄后·甄后诗·甄后墓……………江达煌（252）
- 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讨论会雏议……………姜涛（264）

# 试谈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

王 魏

建安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新起点。从此，“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了。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等作家以他们辉映古今的文学成就，开创了一代崭新的文学风气，使这个时期的文学呈出了独特的风貌。

建安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是建安文学的灵魂。这也正是建安文学的可贵之处。建安时期，天下纷乱，人们在遭受死亡乱离的悲痛，这时，那种经解注疏、歌功颂德、图物写形之类的文学，再也不能表达出这时人们心底的呼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活的、动的、富有热烈的情感，和曲折尽致，深入时代核心的文学抒发出来。”这就是具有时代精神的建安文学。这时的文学作品都毫不例外地腾发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正如刘勰所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命于青土，公干殉质于海隅，德琏总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侔，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资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

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里指出了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就是“梗概而多气”，而形成这种“梗概而多气”的原因，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元稹也曾在《杜君墓系铭》中指出建安文学的特色：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塑赋诗，故其道文壮节，抑扬哀怨，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可见，“梗概而多气”、“抑扬哀怨”，都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悲离之作”自然是时代产物。曹氏父子只是这时作家的代表，建安时期其他作家也和曹氏父子一样，其创作都能捕捉住时代的特征，散发着时代气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人们在遭受战争的荼毒，这是建安时期重要的社会现实，因而成了建安诸子共同注目的问题，他们把反映这一社会现实不约而同地作为自己的创作任务，写出了“悲离之作”，张扬哀怨，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曹操在《薤露行》中，揭露了皇帝的昏庸，由于朝廷“所任诚不良”，才出现了“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的悲惨现实，致使百姓“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在《蒿里行》中描绘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铠甲生虬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军谡令》中写道：“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人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然伤怀。”曹植在《送应氏》中描绘了战乱后洛阳的残破景象：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官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居，气结不能言。

在《归思赋》中写道：“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坏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在《说疫气》中描写了由于战乱而疠气流行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的惨景。

王粲在《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中描绘了他从长安去荆州避难途中所见悲惨景象。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蔡琰在《悲愤诗》中描写的那种“暂截无子遗，尸骸相抗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更令人目不忍睹。

由于作者被伤心的惨目的景象所激动，因而字字句句饱含着作者的悲凉慷慨之情，忧生之嗟，极为鲜明地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还有些作品，虽然在历来的文学史里极少涉及，但从中也不难看到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孔融的《六言诗》其一写道“汉家中叶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专威，万官惶布莫违，百姓惨惨心悲。”曹丕《令诗》中写道：“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这些诗句。同样反映了战乱的社会现实、生灵涂炭的惨景，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体现得也极为鲜明。

建安文学不仅能活现那一时代的背景，而且能表现出那一时代的呼声。“时代精神的特征，能左右艺术家，这个被表现在他的制作上面。那制作才有雄大之趣。”（爱墨孙《艺术论》）建安作家面对战乱造成的惨景，悲伤不已，但同时也激发出他们一种“雄大之趣”，那就是敢于向动乱的社会和悲惨的人生抗争，敢于向天抗争，敢于向神仙抗争，奏出一曲曲富有时代特征的凯歌，这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的重要体现。曹操的《度关山》和《对酒》诗，描写了诗人想往的封建治世，但它产生的基础却是君主昏庸，战乱频仍，饿殍遍野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作者写出了“天地间，人为贵”这富有哲理的诗句，看重人的力

量，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为了实现封建治世消除战乱，他要延揽人材，谱写出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著名诗句，他要为实现封建治世而奋斗，即使行将暮年，也毫不示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他不但向战乱抗争，而且向天命抗争。他曾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人的寿命的长短不是由天来决定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龟虽寿》）不难看出，他对现实、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豪壮情怀也正是由现实所激发出来的。

曹丕在他的诗歌中也同样表现了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在《艳歌何尝行》中写道：“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曹植这位“生乎乱，长于军”的作家，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因而反映他理想壮志的作品更是不乏其例。在《白马篇》中表示：“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鳧鰓篇》中写道：“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视路上人，努力唯是谋。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在《求自试表》中，表示要为朝廷“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即使“身分蜀境，首县吴阙”也心甘情愿。我们从中，深深感到有一种腾发的、任何势力都不可遏制的激情，仿佛看到了他那忠心报国的肝胆，突涉高大的形象。建安时期作家，没有一个能跳出他的时代，写出不表现时代潮流和呼声的作品。就是名字虽在七子之列，然而又被曹操所杀的孔融，在诗歌中也同样表现了对功名事业的追求。在《杂诗》其一中写道：“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措。”抒发了要建功立业的激情。王粲和陈琳在这方面的情感表现的尤为强烈。王粲在诗中写道：“弃余亲睦思，输力竭忠贞。俱无一夫

用，报我素餐诚。”（《从军诗》其二）“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其三）“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其四）。《从军诗》写于归服曹操以后，这是他一生得意时期，把要建功立业的满腔激情抒发了出来。陈琳在《游览》一诗中写道：“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寝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他不愿虚度人生，要建功立业，名垂史册。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乱多灾的现实并没有使建安文人消沉、退隐，而是认识到改变严酷现实的重任，历史赋予的使命，因而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们满怀理想，积极入世，表现了慷慨悲壮之情。

建安文人创作的作品丰富多彩，他们把自己的慷慨悲壮的情感寓于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时代风格。在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游宴诗中，也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壮的情怀，“颇有忧生之嗟”。曹植在《箜篌引》中，描写了饮宴歌舞的盛况，但在诗的最后又写道：“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生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透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乐往哀来，凄然伤怀”的时代灾难感，并由此而腾发出的沉郁慷慨的情怀及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名都篇》在极尽描写游乐饮宴的同时，深深慨叹“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寄寓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慨叹，表现了“慷慨独不群”的精神。

在建安文人的游仙诗中，慷慨悲壮的时代色彩也体现得很明显，现流传下来的游仙诗，都是曹氏父子的。曹操在游仙诗中抒发了一种“不感年往，忧世不治”的感慨。曹操一生志在统一天下，然而直到暮年，这种愿望还没有实现，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前，他深深地感到“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从而“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但他想到的是“万国率土，

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同上）。可见曹操的这种思想是从统一大业出发的。这与他在《短歌行》中所抒发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情是一致的。曹丕在他的游仙诗《折杨柳行》中，表现了否定神仙，积极入世的慷慨情怀。曹植在游仙诗中表达的慷慨悲壮之情更为明显，他在《五游咏》中写道：“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在《游仙》诗中写道：“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曹植由于在政治上遭受迫害，不能忍受现实生活的抑郁。于是托志于空虚的神仙之游，感到“九州不足步”，只有奋凌于空虚之境，才能抒发自己的一腔忠贞之志，诗中饱含着慷慨悲壮之情。曹氏父子的游仙诗，虽然各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和艺术风格，但表现出的慷慨悲壮的基调是一致的。

建安文学的又一总体特征就是五言诗居于主要的地位。

建安时代五言诗得到了迅速发展，五言诗风畅开，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在他们全部诗歌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逯钦立纂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建安二十四位诗人较为完整的诗歌共二百九十七首。而其中五言诗就有一百九十八首。这个统计虽然还不能说很准确，但起码能看出五言诗的份量。象曹植的五言诗比重，占他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刘楨，这位五言诗之善者，现存的诗歌全部是五言诗。可见，五言诗在当时诗坛上是一种主要诗歌形式。

五言诗所以迅速发展，成为建安文人普遍运用的诗体，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诗歌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五言诗和其他诗歌形式一样，都是萌发于民间，从民间歌谣到文人五言诗的出现，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诗经》时代，四言诗中就偶然杂有一些五言的句式，或者有半章，及至全章是五言形式，如《行露》、《北山》等，到了春秋末期，在楚国民歌中出现了

《孺子歌》的形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里虽然还带有语助词“兮”，但可以说是独立成篇的五言形式了，是五言诗的雏形。到了秦始皇时期又出现了《长城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这是五言体，但连句用韵，音节急促，所以还不是完全成熟的五言诗。到了西汉，五言歌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成熟。如汉成帝时出现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这种隔句用韵的形式，标志着五言歌谣的进一步发展。汉武帝设立乐府以后，这种五言歌谣便大量地被乐府采入，成为乐府歌辞。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也开始模仿创作五言诗。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便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诗，由于这首诗“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后张衡写了五言诗《同声歌》，艺术上有所提高。其后的秦嘉、蔡邕、辛延年、宋子侯等，都为文人五言诗的日趋成熟做出了贡献。引人注目的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反映了当时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但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多是在黑暗重压之下，抒发的多是苦闷、哀愁之情，缺乏振奋人心、催人向上的力量。到了建安时代，建安文人非常注重《古诗十九首》的五言形式，而在内容上又有重大的突破，即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运用的诗体，放射出强烈新异的光彩。

其次建安时期五言诗的发展与它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四言诗在《诗经》中是主要形式，在诗歌发展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但到了建安时期，它已无法和新兴的五言诗相抗衡了。当然并不否认建安时期还有几首四言诗写得较为成功。但从总体来看，五言诗是这一时代的文学主流。四言诗所以衰落，首先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的。一时代有



一时代的文学，一时代的文学就要有与相适应的文学形式。在建安文人全力创作五言诗的时候，四言诗就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次是与四言诗本身所具有的弱点不可分的。由于四言诗句子短，容量小，节奏单调，因而诗人的思想感情不容易抒发出来。再就是，《诗经》以后的四言诗，多有摹仿的痕迹。吴讷在《文章辨体辨诗》中说：“大抵四言之作，拘于模拟者，则有蹈袭《风雅》词意之讥，涉于理趣者，又有铭赞文体之消。”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又说：“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则袭其貌也。”可见四言诗自身具有的弊端，必然导致了它的衰落。与四言诗相比，五言诗则显示出自己的优点。它五字一句，比四言诗的句子长，容量大，音节多，节拍奇偶相配，变化多，没有象四言诗这样的摹仿，不受任何束缚，诗人激昂的情感容易表达出来。建安文人思想活跃，面对动乱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抗争，要呐喊，要实现封建治世而贡献才力，五言诗的优点正适合建安诗人表达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所以五言诗在建安诗人手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建安文学的第三个总体特征就是辞赋在建安文坛获得了新生，特别是抒情、咏物小赋大量涌现，成为建安文坛上的一股强大势力。我们知道，建安文学的主流是五言诗，从五言诗的作家作品之多，诗歌内容之丰富，艺术成就之高等方面，都可以这样断定。但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辞赋在当时文坛的势力。赋曾做为汉代文学的主流，在汉代盛极一时，在文学史上占有着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同样重要的位置。但到了东汉后期，汉大赋已成为强弩之末，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的出现。到了建安时期抒情小赋和咏物小赋大量涌现。建安作家，几乎每个人都创作了大量的赋。如曹操有《登台赋》、《鹞鸟赋》等，可惜仅有题目而赋文佚失。曹丕有赋二十八篇，曹植有赋四十七